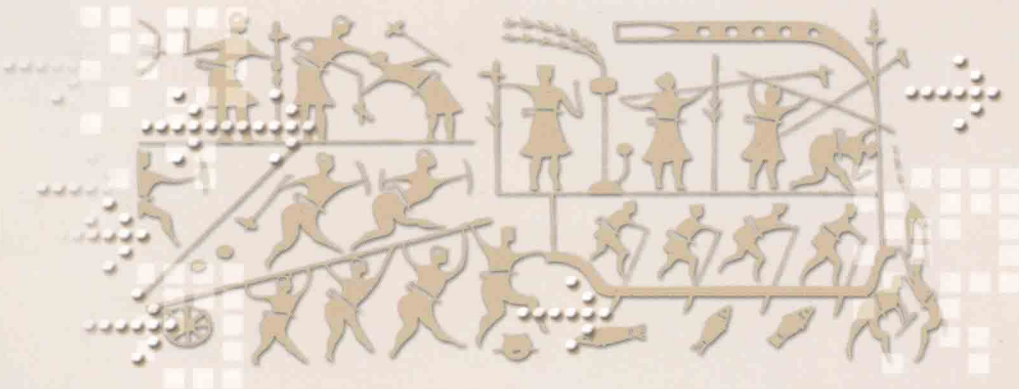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 丛书

主 编：田 丰 李旭明

执行主编：叶金宝 杨向艳

史学探骊： 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与开新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主 编：田 丰 李旭明

执行主编：叶金宝 杨向艳

史学探骊： 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与开新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探骊：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与开新/田丰，李旭明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7531-2

I. ①史… II. ①田… ②李…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420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史学探骊：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与开新

主编：田 丰 李旭明

执行主编：叶金宝 杨向艳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7531-2

2011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5/8

定价：32.00 元

大珠小珠落玉盘（代序）

——《史学探骊》读后 李 凭 001

张曲江集万历癸丑刊本之攘功斗争及集本文字与残余石刻之会勘 岑仲勉 006

《柳如是别传》缘起 陈寅恪 025

战国中山国史札记 顾颉刚 顾洪整理 037

宋代吉金书籍述评 容 庚 046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 刘 节 114

从农民斗争到资本主义萌芽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 傅衣凌 135

中国历史上对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 戴裔焯 141

关于 1922 年香港海员罢工的几个问题 金应熙 164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朱杰勤 182

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 梁方仲 189

清代幕府制的变迁 郑天挺 223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概况 韦庆远 229

丘逢甲离台内渡考 戚其章 241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来新夏 262

史学与史家

——《史学新论》之二 田昌五 267

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 梁钊韬 288

理学的历史意义 张岱年 311

释龟蛇 秦 牧 314

中山君璽考略 饶宗颐 321

桂林石刻《元祐党籍》 陈乐素 329

浅议司隶校尉初设之谜 朱绍侯 345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 陈锡祺 355

论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 李时岳 371

关于中国农学史的若干问题 李根蟠 383

大珠小珠落玉盘（代序）

——《史学探骊》读后

李 凭

我对《学术研究》杂志一向心仪，并不仅仅由于它是南国学术期刊界的一面旗帜，而是因为它长期恪守学术道德与科学准则，所以令我敬重。最近，《学术研究》编辑部遴选了一批以往刊载的重要文章，将它们汇编成丛书，我听说此事，深表赞成。因此，当编辑部嘱托我为该丛书之三《史学探骊》写序时，便欣然从命了。然而，看到杨向艳编辑送来的样稿后，我却为自己的不慎允诺而后悔不迭。因为，《史学探骊》中收录的文章都是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前辈宗师的成果，而我则年资低浅，实在自惭形秽，没有资格作序，只能谈点读后感想而已。

如今衡量学术期刊的等第，有所谓核心与非核心的分野，有所谓A类、B类和C类的区别。其标准是格式化的，追求的目标是转载率和各项影响因子。但是，我倒以为，决定学术期刊高下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支撑它的作者群体；衡量学术期刊优劣的最主要标准，应该是所刊载文章的质量。当然，按照现行的等第，《学术研究》无疑是归入核心期刊之中的A类者；而从作者群体和文章质量的角度考察，《学术研究》则属于更上乘者。因为，就辑录自《学术研究》的

《史学探骊》而言，其中的文章便篇篇精彩，它们大多是前辈宗师的代表性作品。

刊登这些前辈文章的期号，早自1958年《学术研究》初名《理论与实践》时的第2期，刊载了秦牧先生的《释龟蛇》；晚至2000年的第10期，刊载了戚其章先生的《丘逢甲离台内渡考》。这些文章所属的学科，主要是中国历史学，也兼收考古学。其研究对象，远从梁钊韬先生论“曙石器问题”之争起，近到金应熙先生解析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止。数量虽仅24篇，时代却涵盖了各主要的断代，上起先秦，中经汉唐宋明清，下至近现代。其门类则涉及诸重要的分科，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史学理论以及地方文献等专门学科。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方面的文章，几无应景之作，大多为作者本专业的研究成果。它们表达了深邃的学术思想，体现了发表之际的高标准学术水平，反映了所属的专门学科在当时达到的成就。

《史学探骊》辑录了不少长文，按发表的期号顺序计，有《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梁钊韬）、《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刘节）、《关于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的几个问题》（金应熙）、《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陈锡祺）、《张曲江集万历癸丑刊本之攘功斗争及集本文字与残余石刻之会勘》（岑仲勉）、《桂林石刻〈元祐党籍〉》（陈乐素）、《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田昌五）、《丘逢甲离台内渡考》（戚其章）等，这些文章都在万字以上；又如《宋代吉金书籍述评》（容庚）、《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梁方仲）、《中国历史上对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戴裔煊），因为篇幅很长，均

分作两期刊载。这些长文大作都运用缜密的思维，经过细致的解析和透彻的论证，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迄今仍旧是学术界引论的依据。《史学探骊》中更多的是数千字的中短篇论文，如《释龟蛇》（秦牧）、《〈柳如是别传〉缘起》（陈寅恪）、《中山君薨考略》（饶宗颐）、《清代幕府制的变迁》（郑天挺）、《战国中山国史札记》（顾颉刚）、《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朱杰勤）、《从农民斗争到资本主义萌芽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傅衣凌）、《屈大均与〈广东新语〉》（来新夏）、《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概况》（韦庆远）、《论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李时岳）、《浅议司隶校尉初设之谜》（朱绍侯）等，这些文章考据具体而论理深远，或者以小见大，启迪心智，指引人们深入探微；或者高屋建瓴，发现内在的联系，指示事件发展的规律。在《史学探骊》中，字数最少的文章是张岱年先生的《理学的历史意义》，虽然仅为一页，却将理学的精髓显现清晰，那就是，“理学家吸取了佛学和道家的一些思想资料，但其基本精神是回到孔孟，为孔孟的伦理学说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要而言之，《史学探骊》辑录的24篇论文，无论长短，都是值得诵读回味的华章。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而承载这些珍珠的玉盘就是《学术研究》杂志。

前辈的生平与成就，已经为学术界众所咸知，不烦一一赘述，也不敢妄作具体点评，请读者自己品味《史学探骊》这本论文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前辈宗师全都出生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期。岑仲勉先生为最早出生者，生年是1885年；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是陈寅恪、顾颉刚、容庚、郑天挺四位先生；多数前辈是20世纪20年代之前出生的，依时间顺序排列为刘节、陈乐素、戴裔煊、梁方仲、张岱年、傅衣凌、陈锡祺、朱杰勤、梁钊韬、饶宗颐、金应熙、

秦牧、来新夏、戚其章、田昌五和朱绍侯诸位先生；而韦庆远和李时岳两位先生出生年代最晚，生于1928年。到1958年之际，他们中的年长者已近耄耋，早就享誉中外；年轻者已入而立之年，时值风华正茂，也具有累累的学术硕果。而《学术研究》恰于此年创刊，真乃适逢其时而得天独厚。编辑部紧抓机遇，密切联系诸位前辈，在以后的数十年间陆续获得他们的有力支持。通过发表前辈宗师的佳作，《学术研究》将更多优秀的学者吸引和团结在周围，从而营造起浓重的学术氛围。这样，既为学术发展推波助澜，也为自身树立起高品位的学术形象和追求真理的社会影响。

又值得注意的是，分拣这批文章，不难发现它们发表的时间多数属于20世纪的60年代前期和80年代两个时段。其中，60年代前期的文章为6篇，占全部选文的四分之一；80年代的文章为12篇，占全部选文的二分之一。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因为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时段均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历史学经历了由传统史学经近代史学而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占据了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此时的中国历史学界，接受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崭新的思想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崭新的观念审视以往的历史研究，于是一批优秀的科研成果应时发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中国的历史学界经历了空前的浩劫，笼罩于影射史学的阴影之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科学的春天随之来临。经过锤炼的中国历史学界，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吸收和扬弃了诸多海内外学术流派的思想 and 成果，使得自身日益成熟发达，于是又有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

应时问世。《史学探骊》中的文章数量，恰好以 60 年代前期和 80 年代两个时段居多，这并非巧合，更非有意而为，而是对于时代特征的客观印证。阅读《史学探骊》，不仅可以重温前辈宗师的佳作，而且能够豹窥一斑地察觉中国历史学上两次重大转折的痕迹，这正是这本论文集的意义所在。

还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适逢提倡学术的大好时代，而《学术研究》恰好已过知天命之年。《学术研究》深刻地理解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它已经成熟而且稳健，所以并不满足于仅仅继承传统的优秀作风，而是更加追求发扬光大的精神。与此相应，新一代的学问大家也在陆续地脱颖而出。因此，更多的璀璨明珠正在纷纷落入《学术研究》的玉盘之中。

《史学探骊》即将付梓，我有幸先读，以为快事，故而写下上述感想。

庚寅立冬于华南雨静苑

张曲江集万历癸丑刊本之攘功斗争及集本文字与残余石刻之会勘

岑仲勉

汉族文化的扩展，循着自北而南的途径，广东的文化比黄河、长江两流域发展落后，其故即在于此。广东人充任唐朝宰相的，要推曲江张九龄先生为第一位，文集保存得较完全传留到今日的，也以《张曲江集》为最早。这一集本不单在广东文献为瑰宝，就保存原来面目而论，称为唐集之雄，^[1]也毫无愧色。记得抗战开始前两个月，我曾写了一篇《张曲江年谱及曲江集之拾证》，邮寄广州，后由阳朔转昆明，被邮局遗失，本无存稿，大旨已完全忘记。过了几年《广东丛书》第一集用徐绍桀所藏温汝适批校本刊出，温氏对这本文集确曾用过功夫，徐则专业度书，毫无表见，以致讹舛之处，刊削未尽。返粤后，因就所知，写成《张曲江集十刻之表解》的短篇，^[2]近年广东博物馆收进一本，据说仍是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的补刻本。今年春间又根据授唐史时的补充资料，对《曲江集》附录诰命之许多错误，大体加以订正。^[3]

[1] 参见拙著《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2期。

[2] 《广东文物》，第137—139页。

[3] 参见拙著《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

至于全集文字之校勘，因各刻本多已散佚，尚存者难以汇集，暂时无从着手。兹仅将较易为力的勘证，及万历癸丑刻本的攘功案，略述管见，以期完成《曲江集》整理的一份工作而已。

一、万历癸丑刻本的李延大攘功案

这就是所称“祠堂本”的祖本，万历四十一年刻于韶州，祠堂本李延大序有云：“今幸公裔孙筠将兄节琼归原板，为补刻焉，是则贤后此补，岂曰全集，亦集所由全也。”又“所望贤哲之后，若节与筠二昆，当时名士必有绍公而兴起者”。又雍正十三年刻陈象谦曲江文集后序云：“自文庄公抄之馆阁，刻于郡斋，借王文谿重葺后，公之裔爱竹再补刻焉。君讳筠，宿学明经，与乃兄孝廉节相同订梓，遗训珍藏。”（仲勉按：“文谿”乃“金谿”之讹）合观两序，这回重刻无疑是由节、筠兄弟发起，所以我在《张曲江集十刻之表解》就书为“主刻者张节、张筠”。^[1]可是据温汝适《曲江集考证》下，他所购得万历原本，内李序与祠堂本录出者有许多不同，即如前引两节，李序实作“余甚悯之，于是觅公旧集友人家，为补刻焉。然则不佞此补，敢曰全集，抑亦集所由全也”。又“然高山之仰，人当不异我，安知后来之人不有慕公而兴起者”。两相比勘，便见其叙述迥异者计有三点：

（甲）祠堂本“李序”以此次补刻归功于张节、张筠兄弟，对之特予褒扬，李原序则完全不提及他们。

（乙）祠堂本“李序”称补刻据张节琼归原板，李原序则说得旧集

[1] 《广东文物》，第137—139页。

于友家。

(丙)祠堂本“李序”称为张氏兄弟所补，李原序认为延大个人补之。

温汝适氏《曲江集考证》下因作出如下的批评云：

“惟李司勋延大序，今韶本虽载而改易字句颇多，谬误不可读。余曩在京师购得原书，乃知司勋原文本不如此也；其引杨国忠雕盘镂冰事，虽误信《开天遗事》，考证尚疏，而文气明畅，笔致亦俊爽。乃为流俗妄改数十字，沈霾晦昧，几及百年，一旦见原刻顿释凝滞，亟存之以还庐山真面目。读者即古本以正今，则亦如规矩设而方圆不能遁矣。”

若深憾乎后人之擅改者，温氏复于集首所附祠堂本李序，点窜一过，吾人就文论文，自必寄温氏以同情，且不虞其中还有别的枝节。但细想一下，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1. 韶州自万历癸丑重刻之后，经过顺治十四年周日灿（字天近）、曾旅庵（名未详，中州人）一次捐俸镂板，方到雍正十三年之重刊，李序之改窜是在顺治时抑雍正时呢？

2. 无论在任一期间改窜，主持改窜的人总有其动机，相信非无的放矢，其动机是什么？

3. 改窜文义，在翻刻中常会碰见，更改事实则不然，试对勘两序不同之处，最要是延大原序说他自己觅得旧刻，特为补刊，没谈到有别人帮助。改序却说，由于张节、张筠兄弟得琮归原板，从事补刊，并未说延大本人曾出过什么力量。这是事实上很大的矛盾？

顺治本尚存钱朝鼎、周日灿两序。据《广东通志》四三，钱，江南常熟人，前丁丑进士，顺治十年任广东学政。又《广东通志》四四，周，山东（东莱）人，贡生，十四年任南韶道。他们都是外省人，对

万历当地翻刻经过，当然不十分熟悉，两序内也未发现可疑之点。故问题1之解答，我们相信与顺治本无关，其唯一可能即雍正时窜改。

从问题2、3两点来会推，改窜之目标，无疑在事实方面，亦即癸丑翻刻之人事历程，当年陈象谦之书后（引见前），正是桴鼓相应的。

再进一步来窥测，万历癸丑之翻刊，可确信系张节、张筠兄弟的力量，大约当日想请一位朝官替他们作序以郑重其事，故而拉出李延大来。不意延大老不客气，竟把全部工作攘为己力，因而有“余偶携公集，因内焉”。“觅公旧集友人家”和“不佞此补”之种种扯谎及矛盾，是即温氏所谓“司勋原本不如此”者。

李既攘张氏之功，当然人心不服，但为什么还把它刻在卷首呢？这个疑问却不难解答。据《广东通志》二八九，李为乐昌人，字四余，万历二十年壬辰进士，及升吏部稽勋郎中（据序是万历卅五年丁未），未几即乞休。他是当地的大绅，凭借绅士的气焰，居然明目张胆无耻地夺人之功，张氏子孙即使不服，也只得隐忍求全，照本刊出，这是合乎事理的设想。

然而不服还是不服，虽然过去了一百二十多年（由万历四十一年即1613年至雍正十三年即1735年），张氏子孙知其乡人对当年李延大以土霸身份攘夺他人的成绩，义愤填膺，无时忘掉斗争和报复。适再逢翻刻机会，遂把李序攘功的语句，换入当年事实，窜改经过，大约如此。唯是序文既改，恐怕读者拿与癸丑本比勘时不明所以，而张氏子孙又不愿直接攻击李延大，于是请出中间人陈象谦写一篇后序，单说明万历癸丑由谁主持翻刻，明眼人看到，便了然于延大之怎样霸占了。陈象谦可信是好打不平的人，序文的改窜也可能经过他的参酌。

此外改动较要的地方，如“自非丘公得之馆阁，杨公新之韶阳……我韶一代文献无而获有旧而获新者，前后两太史功也”，改为“自非邱公得之馆阁，王公新之韶阳……我韶一代文献无而获有旧而获新者，前后皆赖名贤也”。丘为丘濬，杨为杨起元，“丘”字雍正时已讳作“邱”，故改。万历十二年韶州刻本非由杨起元主持，余已于《张曲江集十刻之表解》历历指出，^[1]改“杨”为“王”，似乎更合于事实。又序末之“同里后学四余李延大序”改为“同里后学四余李延大顿首拜书”，亦憎厌延大自高自大之一端。独改“奈何剖劖不三十年”为“未四十年”，则雍正诸人显然失考，从万历十二甲申数到万历四十一癸丑，实只为二十九年也。

可惜温氏太过大意，没有把原序、改序和陈象谦后序比读，帝审所以改窜的原因，遽然断定“乃为流俗妄改数十字，沈霾晦昧，几及百年”；事实上恰得其反。自有温氏的错判，而雍正时对李延大之斗争，乃湮没至今一百六十余年矣（温书刻于乾隆五十七年即1792年）。温上去雍正翻刻，未六十年，访诸耆旧，当仍有略知当日改本之缘起者，此乃温氏疏于联系查访之过失也。

为要了解李序的原文，我在草《张曲江集十刻之表解》时，曾取广东省立图书馆入藏万历癸丑刻本的李序，阅读一过，此本先经叶德辉藏，后归徐绍桀。阅过之后，使我有点茫然不解。据温氏说，考证转录的李序系据在京购得的癸丑原本，但拿与省立本子一比，则字句间异同很多，最著的是：

温录李序开首云：“盖公仕司勋时，燕国公称为后来词人之冠，明

[1] 《广东文物》，第137页。

皇亦曰：九龄文章，朕日夜师之，不得其一二，真文场之元帅也。是其文名固奕焉当年矣。”祠堂本同。省立本则云：“盖公仕司勋时，燕国公称为后来词人之冠，文名固奕焉当年矣。”缺少二十七字。

又如温录李序的中段云：“曲江固相乡哉！余生相乡，不能为相乡重，然高山之仰，人当不异我，安知后来之人不有慕公而兴起者，而慕公者文章云乎哉？公盖以节义为文章也。当时杨国忠权倾天下，孰不争趋，而公迺比之向火乞儿，至雕盘镂冰，拒不敢献，此其人真可寒奸雄之胆，而壮义士之颜也，文章云乎哉？邵康节闻杜鹃鸣天津而知南人作相……”祠堂本除在“不能为相乡重”句之后，改叙节、筠之事（引见前），自“不有慕公”以下，几完全相同，只“不有慕”作“必有绍”，“而慕公”作“而绍公”，“杨国忠”讹“如曰忠”，“趋”作“趋”，“迺”作“乃”，小小相异。省立本则云：“曲江固相乡哉！故曰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余生相乡，不能为相乡重，然高山之仰，人当不异我，安知后之人不有继公而起者，而非徒秉枢当轴之为荣耳。文章节义，则文献我师也。宋邵康节闻杜鹃鸣天津而知南人作相……”除“后来”无“来”字，“慕公”作“继公”，“兴起”无“兴”字，又“邵”上多“宋”字外，“相乡哉”下多了十一字，“而兴起者”下增减相消，仍少了四十九字。简单地说，温氏所购癸丑本，与省立本差异很大，却与祠堂本相近，煞是可怪！

更如延大之结衔，省立本及祠堂本均著为“忝知政事”，而温录李序却没有。此外字句小小差异者数尚不少，不复缕指。

三本互比之后，就发生如下的疑问，温氏在京购得的原书，既与省立本同为万历癸丑翻刊，为什么李延大序有这样大大的差异？是不是那时李序初次镂板之后，觉其不合，又再改板？但改板如果相去无

几时，自应一律抽换，为什么容许两种不同序文之流行？而且寻其差异，都属于不甚紧要之文字修改，与事实无关，何以弄到大加删削？尤其可怪的，温氏所见李序，除涉事实者外，字句却偏近于祠堂本经过修改之序，这是什么原因？种种疑云，初时使我无从置答，即是说，温氏的李序和省立本的李序，其中必有真伪之分。省立本明是旧刻，似无可疑，温氏所购原书，今虽不可得见，犹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伪在温氏所见的“原书”了。

昔北京书贾往往制造伪本以牟利，这是人人皆知的。据我推测，温氏为研究故，急于购求癸丑旧刻，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奸商要做这宗厚利买卖，一时却找不到相当完本，但他们久于此道，对李序之后先异同，总有其一知半解，比平常人“高明”一些。因此之故，他们遂把雍正刻本的李序伪为万历刻本的李序，然而剪补过多，容易露出马脚，故而只择重要关键，像“王公新之韶阳”，“前后皆赖名贤也”，“今幸公裔孙筠将兄节琼归原板重为补刻焉，是则贤后此补”，及“所望贤哲之后若节与筠二昆”等处，照李氏原序改换，以掩伪迹。温汝适所见之李序，偏与雍正祠堂本相近，就是这个道理。由此观之，误信《开天遗事》，其过又不在李延大而在雍正时诸人。温氏不察，上了他们的大当，反而转售其欺于后人，奇矣！温氏考证初刻于乾隆壬子，再刻于嘉庆丁丑，前后相去二十六年，这个期间，相信他没有见过完本的癸丑原刻，不然，断不会留下这一点严重错误。

由此来看，负弛缪之重责的，应落在徐绍桀身上。徐氏既拥有叶藏旧刻，对于板本源流尤关之李序，竟不取与温氏涂改或录出之文，互校一回，便草率地付刊于广东丛书，本文前面说他“专业废书”并不批评过当。若徐作温氏校本《张曲江集·序》称，“七刻于雍正十二